

引言：由“牝鸡司晨”说起

一个曾经令世人谈虎色变的庞大情报组织，在其盛极一时的年代里，人员数字达到 10 万（不包括边防军）之多，年度经费保障高达 100 亿美元，权限范围几乎控制着国家所有的要害部门，间谍情报、渗透颠覆活动遍及我们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被称作克格勃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一个曾经是世界上工作效率最高、组织机构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情报帝国，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根源。

建立于 1147 年的莫斯科城，原来只是苏兹达里一个王公的领地。公元 14 世纪，俄罗斯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时，俄罗斯最大的城市还是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然而，从西方运往弗拉基米尔的各种商品却都必须经过莫斯科。莫斯科大公从过往的富商手中征收大笔的税金和捐款，巨额财富迅速积累，至伊凡·达尼洛维奇（1325~1340 年）时，这位莫斯科大公竟取得了“钱袋”的绰号。伊凡大公用大笔金钱和财富贿取了尚在俄罗斯保持着统治权的金帐汗国的信任，获得了代征全俄罗斯贡税的大权，进而击败了对手特维尔大公，并与东正教会结成联盟，使总主教彼得移驻莫斯科。接着，在先后兼并了几个周围的公国之后，莫斯科公国更加强盛起来，并逐渐成为整个俄罗斯社会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为在后来的历史中承担起建立统一俄罗斯国家的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引起了瑞典、法国、英国、立陶宛以及罗马教廷等强邻们的极大不安，他们尤其关注着莫斯科公国政治

结构、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为此，这些国家通过派遣使节和其他的外交官员，来搜集一切使他们感兴趣的信息。同时，也充分利用间谍的特殊作用，通过秘密途径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获取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情报。

1428年，立陶宛大公维多夫特应莫斯科大公瓦西里·捷米内的邀请访问了俄罗斯。跟随这位立陶宛大公来访的随从之中，有一个绰号叫“牝鸡”的宫廷小丑，此人以其聪明机智和幽默乖巧深深博得了莫斯科大公的欢心。在瓦西里大公的一再恳求下，维多夫特大公终于忍痛割爱，同意把宫廷小丑“牝鸡”留在了莫斯科大公的宫帟之中。从此，在莫斯科大公身边又多了一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人们对他的敬畏不亚于朝廷中炙手可热的权臣。然而，直到过了400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牝鸡”是条顿骑士团的一名特工。他先是被派往立陶宛，后来又被派到了莫斯科，专门为骑士团搜集这个地区的情报。有意思的是，在“牝鸡”发回的情报中，他利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向条顿骑士团的首领们详细记述了莫斯科大公如何地热衷于扩充自己的军马，从获取马匹的方法、途径、时间、地点，到每次获得马匹的数量，不分巨细，一概收进。成百上千匹自不在话下，就连每次只有二三十匹，甚至只有五六匹的批量也不放过。“牝鸡”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中世纪作战方式的影响，军马的数量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马数量的多寡，自然也就意味着国家兵力的强弱。

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初，是俄罗斯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整个俄罗斯地区的日益统一和强盛，取得空前权势的莫斯科大公面临着来自外国变本加厉的间谍活动和来自国内各种势力的反抗。正在全球到处寻找市场的英国人自然不会放弃这块广袤的土地，他们充分地利用所有的机会和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向这里渗透，使莫斯科公国的领域里到处都活跃着英

国人派来的和为英国工作的间谍。其中，功绩卓越的应属钦斯列尔上尉。他曾经两次以外交官的身份被派驻莫斯科，并运用技巧为英国人从始称沙皇的伊凡四世（1533~1584年）手中争取到了可以在莫斯科公国领地内免税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借此，英国政府趁机向俄罗斯派出了大批从事特殊使命的“商贸公司”。这些“公司”从英国政府那里领取充裕的津贴，主要活动要听取英国有关部门的指示。据史料记载：“在1555年写给英国特工们的指示中，要求他们研究各个阶层俄罗斯人的性格、风俗、习惯、度量以及他们需要什么，缺少什么。”刚刚登上沙皇宝座的伊凡雷帝所面临的国内局面也不太美妙，新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削弱了大贵族的势力，1550年颁布的新法典把各地大封建主的原有权力集中到了沙皇的手中，这些措施自然引起了俄罗斯上层贵族阶层的极大不满，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使刚刚形成的统一国家政权受到空前的威胁。1564年，库尔布斯基亲王在立窝内背叛伊凡四世，投降了立陶宛，使沙皇的集权进程大受挫折。

为了克服内忧外患，保住自己在全俄罗斯至高无上的权威，沙皇伊凡于1565年依靠中小贵族组织起了1000人的近卫部队——“特辖军团”。这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从成立之日起，就享有高度的特权。他们直属于沙皇本人，配有最好的武器和坐骑，着装统一，佩戴专用的徽章，用最快的速度和最残酷的手段剪除一切威胁沙皇伊凡的人物和行为。沙皇非常满意这种使用特殊机构巩固自己权力的方式，在不长的时间里，这支有效的近卫部队的编制就扩大到了6000多人。从此，“特辖军团”作为俄罗斯特工历史的始作俑者，与“恐怖的伊凡”同载于史册。

伊凡四世死后，沙皇“特辖军团”也随之被取消了。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马上建立新的秘密警察组织，但是，刚刚夺得沙皇权杖不久的罗曼诺夫家族对来自国外和国内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警惕却没有丝毫的放松。17世纪初，按照新一

代沙皇的命令，俄罗斯各级军政官员都有责任对所有思想和活动可疑的人进行监视，不管他是俄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边远的荒蛮部落。俄国政府也开始特别重视保护自己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商业领域中的秘密，并在西伯利亚和与波斯、布哈拉、花刺子模、高加索和印度相邻近的许多地区划定了禁区。

俄罗斯反间谍组织真正建立和得到发展的时期，是在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彼得一世当政的时候。彼得大帝（1682~1725 年）于 1697 年下令成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公署，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针对国外间谍活动和国内颠覆活动及渎职行为的国家机构。1718 年，为审理阿列克赛·彼得洛维奇王子叛国案，成立了特设秘密办公厅，专门侦查和审理涉及帝国安全的重大政治案件。阿列克赛·彼得洛维奇死后，这个秘密办公厅并没有就此撤消，而且其职能范围还随着俄罗斯所处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扩大。它不仅负责对国内一切有关地区、机构和外国人进行监视与调查，同时还开始有目的的向俄罗斯的几个主要国际对手瑞典、土耳其、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派出以外交官身份作为掩护的间谍，并对往来的信件进行邮政检查。1762 年，秘密办公厅改编为直属于俄罗斯参议院和总检察长的秘密科，继续从事着为沙皇政府服务的特殊使命，并参与侦查和审理了当时的许多著名的间谍案。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年）时，在扑灭了席卷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广大地区的普加乔夫（1742~1775 年）起义的过程中，沙俄政府的秘密警察机构或密谋于暗室，或遍布于城乡，搜集情报，散布谣言，组织地主武装，捕杀起义领袖，配合围剿的俄军，为女皇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平息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反沙皇起义之后，这位女沙皇意识到建立一支既可以统一指挥，又具有明确分工的俄罗斯国内秘密警察系统的必要性。在 18 世纪下半

叶，俄国的秘密警察组织明确了军事侦察和国内监视的分工，而且在每个总督属下都设有各自的秘密处，以用来对付一切威胁沙皇权力的地下活动。在这一时期显赫于俄罗斯疆土开发和对外关系史中，著名的人物雅金夫·比丘林、亚力山大·弗格涅尔、普热瓦尔斯基等，都曾是在沙皇俄国各级秘密机构的名册上在籍的为俄罗斯秘密警察总监和女皇本人效力的情报工作人员。

19世纪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防范和镇压十二月党人，于1826年7月在沙皇内廷中特别设立了皇家办公厅第三处，将统辖秘密警察和宪兵的权力集于一身。到了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已经把俄罗斯沙皇政府内的秘密机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情报体系：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内政部警察厅暗探局和宪兵团。尽管1917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这些旧式的国家机器顷刻土崩瓦解，但是几百年来在这个特殊领域中形成的传统，却对以后的俄罗斯在同一领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部

从契卡到弗斯勃

第一章 红色利剑

1917年11月7日（俄旧历10月25日）继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自诞生之日起，新生的革命政权就面临着来自俄国内部和外部的强烈反抗和威胁。全国仍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掌握在反革命和外国干涉军手中，各地的君主主义者纠集起形形色色的保皇势力，向革命政权掌握的中心地区蠢蠢欲动。而在红色政权控制的中心地区里，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工厂主、地主，被十月革命解散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不理解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旧职员等中产阶级，都对苏维埃政权持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他们秘密串联、阴谋活动，利用所有可能利用的手段，借当时的饥荒、瘟疫等困难，企图破坏、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异常严峻的形势要求革命政权迅速伸出两支有力的拳头；对外，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进攻和绞杀，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统一革命政权；对内，甄别隐藏在革命政权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打击一切针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惩戒消极怠工、投机倒把等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行为，肃清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内部的隐患，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就形势的严峻程度而言，这两条战线上的任务都是空前艰巨的。但相对比较之下，第二条战线所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得多。对付外线的铁拳已经收拢，并开始针对既定的目标

准确有力地出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虽然，这支军队刚刚经过十月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火洗礼，但其成员中有许多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官兵，他们的丰富作战经验与工人赤卫队和激进的军校生带来的革命热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地投入到前线，有效地挫败了反革命阵营的进攻锋芒，大大减弱了苏维埃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压力。几乎在建立了红军的同时，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迅速打出另一只拳头的必要。但对付内部无形战线上的反革命，需要的将是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对此，一个近于成熟的想法已经在列宁的脑子里形成。

一张影响了苏俄历史的便笺

1917年12月2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写给了他的忠实追随者捷尔任斯基一张便笺，上面明确地写道：

“目前，我们要以非常的措施与反革命和怠工的人们进行斗争。”

就在同一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人民委员们讨论了列宁的指示和捷尔任斯基的报告。随后，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立即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的决议。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俄文缩写为“ВЧК”，通音译为“全俄契卡”或“伏契卡”），由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办公地点设在了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没收的原全俄保险公司大楼内（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即现在俄罗斯联

邦安全局总部大楼)。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还规定了“契卡”的基本任务：

1. 在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和农村范围内侦察、发现和制止、肃清一切反革命及总工的企图与行动；
2. 将所有的总工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送上革命法庭进行审判，并制订与之进行有效斗争的策略和措施；
3. 为有效地、成功地镇压一切危害革命政权的阴谋活动进行前期的侦察和必要的预审工作。

可以看出，“契卡”的工作权限范围最初并不十分显赫，不仅如此，它在组织系统的权力归属上也不十分明确。它在直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的牵制。在“契卡”诞生的最初几年里，除了大量的侦察和监视工作之外，如果没有以上两个人民委员会批准，“契卡”的工作人员和下属机构根本没有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权力，甚至连逮捕嫌疑人犯的权力都没有。然而，从 1918 年初到 1921 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契卡”的权力急剧上升。

催化“契卡”的职权范围和组织结构在短时间里急速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被十月革命风暴摧毁的沙皇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残余势力趁苏维埃革命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外国资产阶级势力的支持下，很快聚集起了强大的阵营，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形成了全面的包围之势，企图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18 年 3 月，一直游弋在科拉半岛附近海域上的英国舰队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英美军队组成的武装干涉军踏上了俄国的领土。接着，美国和日本军队也在太平洋上组成了特混部队，4 月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登陆。外国干涉军的介入仿佛为蛰伏在俄罗斯各地的沙俄旧军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扎

在俄国的外籍军团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和形形色色的间谍情报机构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煽动、怂恿社会上一切对苏维埃政权深怀仇恨和不满的势力，纷纷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破坏和颠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活动。

1918年5月25日爆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掀开了国内战争的序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沙俄军队俘获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组成。早在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攫取了沙皇俄国的外交大权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通过外交和其他有关渠道说服了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把这一批为数几万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重新组建为几个师的外籍军团，在仍然继续的世界大战中由俄国指挥与德国作战。但是，当这支部队被派遣到前线后不久，俄国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为了减轻新生革命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政府与德国签定了布列斯特停战协定，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持中立，不介入当时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从乌克兰转道欧洲战场继续参加对德国奥匈帝国的作战。随着英美等国干涉部队由沿海各港口向俄罗斯腹地的推进，各国外交使团和情报机构加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挑拨和蛊惑宣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当地的俄国白匪相结合，成为俄罗斯国内的一支最大的反革命武装组织。

另一方面，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里发生的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与白军作战前线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部队的集体叛变，日益蔓延的白色恐怖活动，也都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1918年7月，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借1918年1月布列

斯特—利沃斯托克和谈失败而组织领导了未遂的起义。同年 8 月 30 日，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进行演讲时遭到暗杀，身受重伤。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的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组织周密侦察得知，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有着国际背景的阴谋活动。而前线变节红军将领策划的阵前叛变，造成了对苏维埃革命政权更加惨重的损失。原红军东部前线司令员、前沙俄军队上校穆拉维约夫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组织的叛乱相呼应而在前线部队中组织的叛乱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驻守在伏尔加河沿岸的重镇喀山，从此沿河向南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东部的行政中枢辛比尔斯克（后来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这里集中了苏俄政权在这一地区许多重要行政机关、粮食和物资储存以及准备抵御东部白军攻势的大批部队和辎重，同时，在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队中也集中了大量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是连接俄罗斯中心地区与西伯利亚地区的要冲地带，具有丰富军事经验和战术指挥能力的穆拉维约夫选择这里起事是经过周密地考虑的。开始，穆拉维约夫利用职权，先将其认为异己的部队逐渐调出这一地区，接着，又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分批地向这里集中，并且，下令将一些在十月革命初期产生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社会渣滓释放出狱，使之成为一支为己所用的武装组织。

1918 年 7 月 10 日 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动了叛乱。他率领部队乘船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在辛比尔斯克登岸，占领了这座城市的火车站、邮局和电报局，包围了当地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驻地，逮捕和劫持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即后来的苏联红军元帅）在内的当地苏维埃各级军政领导人。接着，穆拉维约夫即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革命政权，并且通电俄罗斯全境，在俄罗斯各界煽动继续沙皇俄国政府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民族战争”。穆拉维约夫组织的军事叛乱行动使苏维埃革命政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为了平息

这次叛乱，红军中有几万将士牺牲了生命。而在这同一时期，与上百万外国干涉军和白军遥相呼应的大规模内部叛乱有数十起之多。打着各种旗号成立起来的反苏维埃政权和各种名目的“民族军”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工作人员和红色政权的拥护者，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工农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对红色苏维埃革命政权构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

危难中的紧急法令

面对遍及全国的内战烽烟，面对自己身边和内部日益嚣张的敌人，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们再一次地意识到，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和严厉的措施，才能使革命政权在这种空前困难和危急的历史关头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刚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生存、发展。

1918年底，列宁亲笔签署了一项标题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难中》的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向全体俄罗斯人民说明了当时严峻的国内形势，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革命政权、热爱俄罗斯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以及各族人民，与各级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保卫既得的革命成就，保卫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同革命的敌人作决死的斗争。针对隐蔽战线上已经接近白热化的残酷斗争形势，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在这个法规中明确指出：“敌人的代理人、受派遣者、投机倒把分子、刺客、恶霸、反革命煽动分子、外国间谍，一旦被我抓获，应立即就地枪决。”

这一项具有极大权威和效力的特别法令很快就在全俄各地得到贯彻和执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在领导同白军坚决作战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内部和身边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力度。作为这条战

线上的尖兵，全俄契卡在这一非常时期对敌斗争的权限和能力在法律及组织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首先，对于契卡来说，这个相当于宣布全俄罗斯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非正式地使契卡获得了可以不经任何审判和不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即能够在无论是前线部队还是后方机关中执行死刑的权力。尽管契卡为此也作出了诸如其工作人员在因情况紧急而未经法律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批准，但在执行之后须向所在的契卡组织和上一级契卡机关作出详细汇报的规定，但是，这一补充性的规定在当时已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几乎无法认真执行。而且，已经把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的契卡，其他方面的权力也正在迅速扩大、膨胀，这种本来就难以产生根本性束缚作用的补充规定，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之下能够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除此之外，在全俄苏维埃中央和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组织和行政措施，使全俄契卡的组织系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第一，鉴于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革命领袖和政府高层领导人遭到敌人刺杀的恶性事件，全俄契卡开始对内部的保卫工作予以高度的重视。为此，全俄契卡专门建立了两个特设的组织，以担负保卫全俄苏维埃党政高级领导人的特殊使命。这两个特设的组织是特务支队和特别部队，它们都直接听命于全俄契卡。前者多以秘书、司机、随从的隐蔽身份出现在领导人的工作、居住、外事和考察等场合；而后者则更多地负责以上场合的外围环境和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党政、财经和军事重要机关及设施的警卫工作，必要时则须参与全俄契卡领导下对较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颠覆及其他直接危害全俄苏维埃政权存在和正常工作的阴谋活动的直接行动。无论从装备上，还是从人数上，后者都大大多于前者。但是，前者在对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要求上

要比后者高得多。

第二，在全俄契卡的统一领导指挥之下，在全俄罗斯各地方也建立了契卡组织，构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协调打击隐蔽反革命势力的高效反应网，从而使得全俄契卡在与俄罗斯全境范围内乃至境外的所有隐蔽敌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够无处不在地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并且避免受到来自苏维埃政权内部机关其他部门的制约和掣肘，为契卡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最大的自由度。

第三，1918年7月15日，根据当时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在与白军作战的东部前线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对敌进行军事斗争中的隐蔽行动，重点是侦察红军内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内部的通敌、变节、间谍等反革命活动，把同公开敌人的军事斗争与同内部隐蔽敌人的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后，又在全国各地前线都成立了同样性质的特别委员会，行使相应的职权。1919年元旦，在全俄契卡总部内又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央特别部，协调领导全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2月，又把各军种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权归于这个中央特别部的统辖之下，使全俄契卡实现了对红军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和控制在当时苏维埃国家机器中持续发生的通敌、叛变等严重威胁红色政权存在和巩固的行为达到了有效的扼制。

第四，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负责边境安全的契卡组织，并且在这些边防契卡的领导下建立了陆、海、空三兵种的边防部队。全俄契卡通过设立在各边境地区的契卡组织对全俄境内的边防部队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同时将保护各地海关的正常工作、打击走私活动、防止国外间谍情报人员的渗透、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和边境贸易活动等任务，同抵御外国武装力量的渗透和入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使全俄契卡组织对敌斗争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有效地巩固了全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在强

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扼杀行动面前改善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力量对比，同时，也使全俄契卡在国家组织中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并对其后来的组织规模以及对俄国乃至苏联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日益严重的前线和后方形势，又进一步迫使苏维埃革命政权在不断地加强契卡组织工作职能的同时，还注重确立其在俄罗斯社会上的法律地位。1919年6月2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一项法令，不仅使契卡在俄罗斯社会革命的特殊时期具有了更多、更具体的各项特别权力，而且，还使契卡所采取的各种秘密手段甚至于某些恐怖措施进一步合法化。这项法令规定：“对于一切叛变革命、间谍活动、阴谋破坏军事和交通设施，抢夺和盗窃国家物资，纵火，隐藏叛徒、间谍和用于反革命活动的武器，利用投机倒把手段制造粮食等市场的恐慌等罪行，契卡应该采取独立的、直接的有效打击行动。”同年10月21日，根据全俄苏维埃的这一系列法令和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的指示，全俄契卡建立了专门针对上述种种犯罪行为进行审判的特别法庭。空前的政治权力和明确的法律地位使全俄契卡在俄罗斯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扮演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来自内部的洗礼

为了革命政权的巩固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是否必须采取红色恐怖的手段来对付它的敌人，是否需要契卡这样的特别组织来保卫和参与苏维埃政权的正常工作，这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革命政权高级领导层内部曾经发生过激烈地争论。

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反对通过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甚至不惜借党外报纸向俄罗斯社会和布尔什维克的

敌人走露起义消息的加米涅夫，最早在党内提出了反对使全俄契卡权力过大的激烈批评。他认为，尽管当前处于革命以来的最严峻的关头，但是建立全俄契卡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权力的特别机构和组织体系，必然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且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表现在这一特别领域中的独裁行为”。为此，加米涅夫多次在有关场合对全俄契卡的工作方式和权力范围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1918年11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由他组织拟定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加米涅夫明确地提出取消全俄契卡组织和机构的要求，而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只设革命法庭，将全俄契卡的所有职能和权力全部合并到革命法庭之中。同时，为了防止革命法庭的权力过于膨胀，他建议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再设立一个特别的工作委员会或小组，用来监督和领导革命法庭的工作。

另一个积极反对建立和加强全俄契卡组织的人物，是全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司法人民委员施坦因贝格。由于契卡工作职权范围的扩大，他深深地担心自己的机构在全俄苏维埃政权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下降。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坦因贝格是一个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最初时期，必须全力保障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行，任何凌驾于法律和执法机构之上的组织及其行为无疑都是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威的动摇。在内外敌人夹攻的严重时刻，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也只能是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使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国家机器尽快有效地、正常地运转起来，除此之外的其他应急手段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应努力健全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各项立法制度。同时，施坦因贝格主张积极促进新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所有工作人员学会运用法律、规章从事各自的本职工作以及